

他们早在我们野蛮时期的六百年前，在整个北方还不会书写的年代，在希腊人刚刚开始用智慧认识他们自己的时代，就教育人如何快乐地生活，不带任何炫耀，也不假任何欺骗。

——伏尔泰

中国

欧洲的样板

——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



张允熠 陶武 张弛◎编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中国

欧洲的样板

—— 宋时期儒学西传欧洲

张允熠 陶武 张弛◎编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 / 张允熠,
陶武,张弛编著. —合肥:黄山书社,2010.7
ISBN 978-7-5461-1471-2

I. ①中… II. ①张… ②陶… ③张… III. ①儒家-
传统文化-中国-影响-欧洲-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6776号

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 张允熠 陶武 张弛 编著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印制:李磊
责任编辑:宋效永 徐娟娟 路子强 装帧设计:牛倪锂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经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3.75	字数:400千
版次: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书号:ISBN 978-7-5461-1471-2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主题研讨

- 真实的历史,深刻的渊源——论儒家思想与近代欧洲哲学…………… 张允熠 (2)

上编 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政治与社会的介绍

本编专论

- 耶稣会士在北京…………… (英)赫德逊 (64)

本编选摘

第一部分:哲学

- 中国人的书籍和学术…………… (葡)曾德昭 (77)
在孔孟家乡的见闻…………… (西)闵明我 (81)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序言(节译)…………… (法)费彻尔 编 (85)
孔子的故事和原则…………… (法)李 明 (88)
中国的哲学…………… (法)杜赫德 (95)

第二部分:政治与社会

- 三位欧洲人讲述的故事(节译)…………… (西)佩雷拉 等 (109)
中国的科学与科举…………… (意)利玛窦 (119)
中国的政府和政策…………… (法)李 明 (131)
中国的考试制度…………… (法)杜赫德 (139)
中国人的做派和性格…………… (法)杜赫德 (146)

中编 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反应

本编专论

- 启明时代…………… (德)利奇温 (156)



伏尔泰和孔夫子	(法)安田朴 (177)
休谟哲学可能受东方影响(节译)	(美)雅可布逊 (190)

本编选摘

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	(德)莱布尼茨 (199)
《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	 (德)莱布尼茨 (236)
致闵明我的两封信	(德)莱布尼茨 (246)
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	(德)沃尔夫 (255)
告读者书	(法)马勒伯朗士 (268)

下编 欧洲学者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认识

本编专论

十八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英)赫德逊 (275)
哲学家统治者——早期西方对儒家学者的印象	(美)莱特斯 (289)
中国政治与重农主义的起源	(美)马弗利克 (301)

本编选摘

中国的科举制度	(英)波 顿 (315)
中国的专制主义	(法)魁 奈 (317)
在一个哲学王治理下人民的真正幸福	(德)沃尔夫 (338)
论中国	(法)伏尔泰 (351)
中国	(法)伏尔泰 (360)
中国的风俗	(法)伏尔泰 (366)

后 记	(375)
-----------	-------



我们欧洲的统治者知道这些榜样之后,应该赞美,应该惭愧,
尤其应该仿效!

——伏尔泰

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相匹敌。

——狄德罗



主题研讨

真实的历史，深刻的渊源

——论儒家思想与近代欧洲哲学

张允熠

就在近 80 年来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危机风暴从华尔街平地卷起进而席卷全球之时，2008 年 10 月 1 日的西班牙《国家报》针对在中国天津刚刚闭幕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题为——《中国是欧洲的样板》。“中国是欧洲的样板”——这句非同寻常的话语无论对于近代的欧洲人还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虽然实际上不应该陌生，但听起来总有点像天方夜谭。因为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压根儿就是一部中国人挨打受侮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拜西方为师、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国是欧洲的样板”，而是“西方是中国的样板”——这似乎更天经地义。然而，西班牙《国家报》那行醒目的文章标题，似乎强制性地让人们又重新召回到二百多年前欧洲的 18 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样板”——这正是当年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提出的口号，《国家报》只不过是重申了二三个世纪前近代欧洲先贤们的主张而已。

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案头放着一本美国学者马弗利克（Lewis Maverick）1946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书名就是《中国为欧洲的样板》。^① 这本书的上卷是马氏本人对启蒙时代中欧之间思想文化接触的回顾，下卷则收录了 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的《中国的专制主义》的英译本。在魁奈、伏尔泰等 18 世纪欧洲时贤们的心目中，中国的开明专制是比希腊的民主政体和罗马的共和政体更优越的政治体制，中国无疑是欧洲的样板，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但是，自 1840 年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带给中华民族的是百年耻辱和遍体鳞伤，在西方思想界，西方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取代了当年的东方主义，中国不再是样板，而是备受羞辱的对象。相反，欧洲成了中国的样板，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所有这

^①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aul Anderson Company, San Antonio, Texas, 1946.



些都不能覆盖中西交往的全部真实历史,即使在“中国热”开始退潮、中国国势开始衰败的19世纪初,西方主义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曾经是我们的样板。”^①

不管谁是谁的样板,抑或互为样板,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坚毅前进的脚步。而今,中国正在崛起,面对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复兴,我们需要谦卑,也更需要自信。回顾“中国曾经是欧洲的样板”这一实实在在、不容怀疑、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开来日之眼界。五千年的古老民族一路走来,还有什么比历史更能为鉴、更能为师的呢?

一、中西交通与儒学西传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虽然中欧双方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尚不足征,但仍然有案可稽。确凿的证据是当年罗马皇室、贵族和富豪们趋之若鹜的名贵织物——丝绸,这是从遥远的东方“丝国”(希腊语为 Seres,音译“赛里丝”)长途贩运而来的。“丝国”即中国。考古学表明,沟通中西方的著名的“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张骞“凿通”之前就已存在了,它还有着“玉石之路”、“瓷器之路”的别名。沿着海、陆两大通道,汉唐时期,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和各种往来已相当频繁。元代蒙古军队西征,直捣欧洲腹地多瑙河流域,横贯欧亚大陆东西间的陆路交通空前畅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在这时期来到中国的。中、欧之间的海上交通于15世纪的“大航海”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时,欧洲流行“东方主义”,神秘、富庶的东方令西方人向往不已,出于对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和黄金的奢望和需求,欧洲人开始了大探险的历史征程。

历史喜爱制造契机,契机转而创造历史。1453年,从毗邻中国西域、经过漫长迁徙而进入小亚细亚半岛的一支突厥人,一举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延宕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从此彻底覆灭,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商路也分别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所控制。为了走向东方,欧洲人急于寻找新的道路。意大利人哥伦布年轻时十分推崇他的同胞马可·波罗,对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心驰神往,他相信当年还不十分成熟的

^①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Ontario, N2G 3L1, Canada, 2001. p141.



“地球”理论,认为向西航行也可以绕行到东方。于是,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向西航行跨越大西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误把它当成了印度。接着,他又进行了三次类似的航行;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并于第二年到达了印度,打通了从欧洲直抵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线。1519-1521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首次作环球航行,成功地横渡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结果在与菲律宾土著民的冲突中被杀。直至1511年后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海峡,标志着东西方实质性接触的新纪元的真正开始。

尽管欧洲人进行了上述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航海探险活动,但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却是由中国人揭开的。早于麦哲伦一个多世纪,中国的郑和于1405年奉明朝永乐大帝的命令进行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海行动,至1433年,郑和接连七次下西洋,其航海船队规模空前,横渡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海岸。郑和与欧洲航海家们向海洋进发的目的、背景很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居住在地球两边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相吸力,并于15世纪彼此之间再次努力向对方伸出了联络的触角。

15世纪的航海探险活动,客观上为17到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向海外扩张市场和抢占殖民地开辟了道路,也为16世纪罗马教廷向亚非各国传播基督教充当了开路先锋。海路打通,导致各种传教团体纷纷东向,传教士们肩负着向非基督教地区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使命,客观上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媒介和桥梁。具有说服力的案例之一是:几乎在罗马教皇试图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同时,中国的儒家经典也传入了欧洲各主要国家。如,早在16世纪,从未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人门多萨^①就根据在中国南方活动的传教士、商人、水手所写的报告忠实地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大中华帝国史》,该书1585年用西班牙文首版,1588年又出了英文版,至16世纪末,共用7种欧洲文字重印了46次,为欧洲学者了解、研究中国所广泛利用,成为此后欧洲汉学兴起的奠基性著作。随后,成功地进行“儒服传教”的意

^① 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1545-1618),西班牙籍历史学家。他根据到过中国南方福建等地的三位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的传教士、商人和水手的报告,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于1585年在罗马首次出版。



大利传教士利玛窦^①于1591-1594年首译朱熹注的《四书》,金尼阁^②于1626年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③与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④于1662-1669年合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带往欧洲出版。他又独译了《中庸》,这两本书于1672年在巴黎重版,书后附录了《孔子传》和孔子画像。与此同时,殷铎泽还与郭纳爵合译了《论语》。五年后,另外一部被广泛阅读介绍中国的著作出版,它是由基歇尔^⑤利用从中国传来的图片编撰印成的《中国图说》。1687年,比利时神父柏应理^⑥等人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重点向西欧介绍了中国宋代的新儒

①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马塞拉塔城人,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杰出的学者。他于1583年来华,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华27年,对沟通中西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②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字四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610年来华,1615-1617年回欧洲寻求支持,1619年带领16名传教士重返中国。1615年,金尼阁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他翻译并增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成为继西班牙人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后的又一部较早的欧洲中国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③ 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字觉斯,意大利耶稣会士。1659年与卫匡国(Martino Martin,1614-1661)同来中国,两人在杭州去世,同葬杭州。殷铎泽除译《大学》、《中庸》之外,还与柏应理等人合著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对儒学在欧洲的传播贡献巨大。

④ 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葡萄牙耶稣会士,1634年来华。

⑤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法国耶稣会士。一生著作等身,博学广识,被称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⑥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1681年返回欧洲。1687年他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是17世纪在欧洲传播儒家哲学最广的一部著作,一直到18世纪,不少欧洲著名的哲学家都通过这部书来了解中国哲学。除此之外,还撰写出版了关于中国的历史、语言和医学的著作,是当时欧洲著名的中国学专家。1693年返华途中不幸在船上遇难。



家哲学。在此之前,还有曾德昭^①1641年的《大中国志》、安文思^②1668年的《中国新志》、卫匡国^③1655年的《中国新图志》和1658年的《中国上古史》等书,这些都是早期西方中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也涉及到儒家哲学,并附有伏羲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图。可惜的是,这些书长期以来没能得到中西方学术界的重视。1692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④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这也是一本在欧洲影响颇巨然而却给李明本人带来厄运的著作。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神父马若瑟^⑤著《书经以

① 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6-1658),葡萄牙耶稣会士。1613年来华抵达澳门,1637年离境返回欧洲,1640年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1642年到达罗马。1644年4月,曾德昭再度被派往中国,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1658年7月18日逝于广州。曾德昭在返回欧洲期间于1641年用葡萄牙文撰写《中华帝国显赫和伟大的历史》,原标题为《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传教报告》(*Relacao de propagacao de se regno da china e outros adjacentes*),后经历史学家Manuel de Faria y Sousa的整理,并翻译成西班牙文,于1642年出版。曾德昭被称为葡萄牙的“中国学之父”,由于自18世纪中国研究转向法国,曾德昭的著作少有提及。

②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葡萄牙耶稣会士。1640年入华在四川传教,1677年逝于北京,在华37年。1668年他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赞扬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于巴黎出版。

③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即马尔蒂尼,字济泰,意大利耶稣会士。1648年由印度入华传教,1651年3月离华返欧,1654年参加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的辩论,1657年再次赴华,1661年病逝于杭州。卫匡国返欧期间写了几本书,以1655年和1658年用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图志》和《中国上古史》影响最大。

④ 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字复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684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同年派遣来华,1687年与张诚、洪若翰、白晋、刘应等人到达中国。1691年,李明返回法国任耶稣会长老。1692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被批评为“西方的堕落”。此事与当时越演越烈的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交织在一起,引起法国教会间的激烈争论,Sorbonne神学院在两个月内开了二十多次会议对《中国近事报道》进行审查,有160位神学家发表了意见。

⑤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法国人。1683年加入耶稣会。1698年随白晋来华,1736年逝于澳门。马若瑟著有多种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是18世纪西方中国学界的奠基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1731年,马若瑟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先后刊发。伏尔泰以马若瑟的法文本为底本,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法语戏剧,名为《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轰动全城。此后,英国剧作家墨非(Murphy)又根据伏尔泰和马若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了《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赵氏孤儿》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第一部戏剧,马若瑟和伏尔泰的这一成功之举,成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前之时代及中国神话》、《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和《经传议论》等书,其中《经传议论》曾经清康熙皇帝御览。这些书的西文版在欧洲的流传促进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中国热”随之在欧洲兴起,“中国学”(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进入18世纪后,法国神父汤尚贤^①著《易经注》,对欧洲知识界了解和研究《易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神父钱德明^②著《孔子传》、《孔子弟子传略》,在当时法国兴起的“中国热”中如火增薪。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欧洲中国学研究的最初基础。另外,《利玛窦札记》在欧洲的流传,龙华民、^③艾儒略、^④柏应理、闵明我、^⑤马若瑟、巴多明^⑥等传教士跟欧洲的大量通信也引起了欧洲中国学界的重视,从18世纪初期开始,法国就有人开始收辑编纂这类通讯集。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16至26卷约11卷是从中国寄来的。^⑦这些都给欧洲学者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成为欧洲18世纪法国著名中国学专家杜赫德^⑧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重要素材。基于这种文化传播的背景,当时的欧洲顶尖级的学者,无论其对中国的看法如何,都无法回避中国这个话题,多多少少都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表

① 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1),法国耶稣会士,1701年来华。

②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字若瑟,法国耶稣会士,1750年来华。钱德明入华的时代与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已发生巨大变化。进入18世纪后,因中国朝廷与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1723年雍正帝全面禁教,1734年,乾隆再次诏命禁教,钱德明于禁教后二三十年来到中国,可以算作最后一位耶稣会士了。

③ 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597年来华。在利玛窦死后,由他接替利玛窦的职务。

④ 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字思及,意大利耶稣会来华传教士。自1613年入华,至1649年卒于福州,在华传教达36年。

⑤ 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1645-1670年在华传教。但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前一个闵明我于1670年离开中国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京作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助手。

⑥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法国耶稣会神父。1698年来华,1741年卒于中国北京。

⑦ 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贾植芳《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法国神父,17至18世纪著名中国学家。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被誉为“法国中国学三大奠基作之一”。该书轰动了欧洲,几年之内便出版了3次法文版,2次英文版,另外还出版发行了俄文和德文本。



一些看法,从培根^①到莱布尼茨,^②从康德^③到歌德,^④无一例外——因为这是当时欧洲学术界的一种时尚。

到了18世纪,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不断涌现,影响所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们还能在梵蒂冈图书馆看到14种西人研究《易经》的著作。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学者评介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著述中,影响最巨者当推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的中文标题是《西文四书解》,说是《四书》,独缺《孟子》。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导言》部分,它对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分别进行了评介,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图,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以及朱熹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概念。1691年蓝登尔·泰勒(Randal Taylor)以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和法国人彼埃尔·萨夫亥(Pierre Savouret)的《孔子的道德:中国的哲学》为蓝本,改编为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该英译本后来被多次印刷,成为当时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了解孔子和中国哲学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有些研究者在论到莱布尼茨与《易经》的关系时,总是以莱布尼茨自己

①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16至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② 戈特弗里德·威廉·凡·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17世纪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和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同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近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基础原理的创始人。1700年,他被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委命为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同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全世界的四大科学院即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罗马科学与数学科学院、柏林科学院都以莱布尼茨为核心成员。莱布尼茨博览群书,涉猎百科,是当时欧洲推崇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坚力量。他的哲学思想对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③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一生著作等身,在天文学和哲学上都有不同凡响的创说。尤其“星云假说”和撰写“三大理性批判”的哲学革命,奠定了他作为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马克思曾把康德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页)。

④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



的话为依据,坚持认为莱布尼茨是在1703年接到法国传教士白晋^①寄给他的卦图之后才知道了《易经》和“伏羲卦图”的,这有违事实。实际上,莱布尼茨在1687年12月9日写给白晋的信中就明确提到了白晋给他的卦图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的卦图有别,并评价该书翻译的《四书》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②这说明莱布尼茨在看到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前已经看到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卦图了。况且在此之前,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早于1658年就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刊行,阿姆斯特丹是笛卡儿学派的大本营,也是当时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家庭藏书丰厚的莱布尼茨完全有条件看到卫匡国的书。还有资料显示,莱布尼茨6岁丧父,他的父亲留给他的比金钱还要宝贵的大量藏书,他在年轻时就可能通过阅读这些大量的家藏文献接触过《易经》的内容和卦图。比如,莱布尼茨在去世的那一年曾就他与“伏羲卦图”的事再“解释一下”,有意无意之间提到了德国汉学家安德列·弥勒^③于1678年出版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这本书中也载有“伏羲卦图”,它是由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所述“伏羲卦图”谈起的。^④ 别外,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卫匡国16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上古史》,这本书所收录的“伏羲六十四卦图”十分详尽,与柏应理书中的基本一致。这表明莱布尼茨极有可能在1658-1679年就已经知道了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象画法(即所谓的“二进制”)。

①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法国人。1678年加入耶稣会,1684年被法王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1687年抵达浙江宁波,次年入京,1730年逝于北京。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出使法国。白晋跟莱布尼茨建立了长期通信联系,莱布尼茨不断向他求教中国的问题,他曾把邵雍系的《易》图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明确说过,这跟他已看到过的卫匡国和柏应理书中的《易》图(朱熹系)不一样。

② 吴孟雪:《柏应理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秋之卷,第142页。

③ 安德列·弥勒(Andre Muller, 1630-1694),柏林法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热心研究中国,他1678年著有《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介绍了13世纪阿拉伯学者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对《易经》的研究。

④ (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05页。



这里涉及到学术界争辩不休的两个问题,一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的发明是否与《易经》的六十四卦的卦图有关?二是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是否接触过《易经》八卦的卦图?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该分开来谈。第一个问题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因为“二进制”是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没有“二进制”算术,但不排除莱布尼茨把八卦的两个爻划的排列组合法则视为“二进制”,或在发明“二进制”时从中获取灵感得到重要启发;第二个问题应该从史实和文献上去推理,而不应以莱布尼茨迫于当时的个人处境说过为自己开脱的话为根据。我倾向认为:诸多资料显示,莱布尼茨早在发明“二进制”算术之前就已经见过不同于白晋寄给他的另一类“伏羲八卦”的卦图了,他曾表白说“没有见过”——这仅是针对白晋给他的那类卦图来说是成立的。

莱布尼茨与“伏羲八卦”之间的这桩公案是另一讨论的专题,此处就不多述了。

总而言之,16至18世纪,正是欧洲思想界大解放、大转型的时期,是恩格斯所说那种需要思想巨人从而产生了思想巨人的时期。中国儒家的思想适逢其时传入,无疑给欧洲的启蒙运动火中增薪。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孔子名义下以朱熹哲学为实质内容的儒家思想的西传,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影响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相当重要、不容忽视的。

那么,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对于这一疑问,可从一位美国学者埃德蒙·莱特斯(Edmund Leites)的论文中揣其大概。莱特斯指出,16至18世纪随着耶稣会士往来中西之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书志编纂学者对这些书信集散布的状况加以研究(研究的项目包括:购书者系何人?收藏这些书信集的是哪家图书馆?哪些书商?),结果显示散布之广相当可观——从波兰到西班牙都有所发现”。^①在中学西渐的过程中,传教士的书信立了首功,通过欧洲学者们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成为文化界的常识……十八世纪任何一名受教育的士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会

① (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1页。



远胜于今日一名受过一般教育的知识分子”。^① 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和所谓“中国原则”,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传遍欧洲并为欧洲所尊崇、所吸收和所利用的。

英国学者赫德逊(Hudson)写道:“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安东尼王朝的时代之后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组织解体的那段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另一个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那段时间。在第一个时期,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庭艺术的特色,从印度(对不起,印泽教长),则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内核。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②

事实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五百年间,欧洲流行的是“东方主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此时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歌颂东方、赞美东方和崇尚东方的言词见于该时期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述中。东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术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③莱特斯也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或许实情亦复如此。”^④即使有人攻击中国,总挡不住“中国热”的主流,如魁奈对孟德斯鸠批评中国言论的反批评便反映了此种情形。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哲学家当王”的国

① (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1页。

② (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页。

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④ 同①,第96页。



度，是欧洲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情况直到 19 世纪才真正有所改观。

儒家思想对欧洲的影响，还可以从当时法国的报端上看起来。如 1688 年 6 月《巴黎学术报》(*Journal des Savants*)上刊载了一段话，可以供今天的人们深思——“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信义、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以及畏天敬神之道，特别注重，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听了一定觉得兴奋。再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启示”。法国文学史家 G. 莱姆森 (G. Lamson) 认为，17 至 18 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之文化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家以鼓励是也”。^① 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曾引用西人的研究成果说英国的亚当·斯密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英国思想界不像德法两国那样推崇中国哲学。^② 然而写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斯蒂芬 (Stephen)^③ 爵士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从休谟^④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⑤ 从斯蒂芬引用休谟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英国自然神论的流行同法德两国一样，也是得力于吸收了中

① 宋晞：《中国文化与世界》，新中国出版社（台北）1970 年版，第 22 页。

②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 - 1790)，18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曾在欧洲大陆考察学习期间结识了魁奈、杜尔哥等法国重农学派的首领，尤其深受魁奈的影响，引魁奈为挚友。其 1776 年刊行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据英国当代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说，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思想，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法语的译文为 *Laissez-faire*，意为“自由放任”，斯密从魁奈那里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见迈克尔·瓦蒂基奥蒂斯 (Michael Wadjiiao Ortiz)：《意义重大的思想》，载《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in Hong Kong*, 10 - 06 - 1999)。

③ 莱斯利·斯蒂芬 (Leslie Stephen, 1832 - 1904)，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因写作出版了《英国名人大辞典》和《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而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头衔。

④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 - 1776)，18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

⑤ 同①。